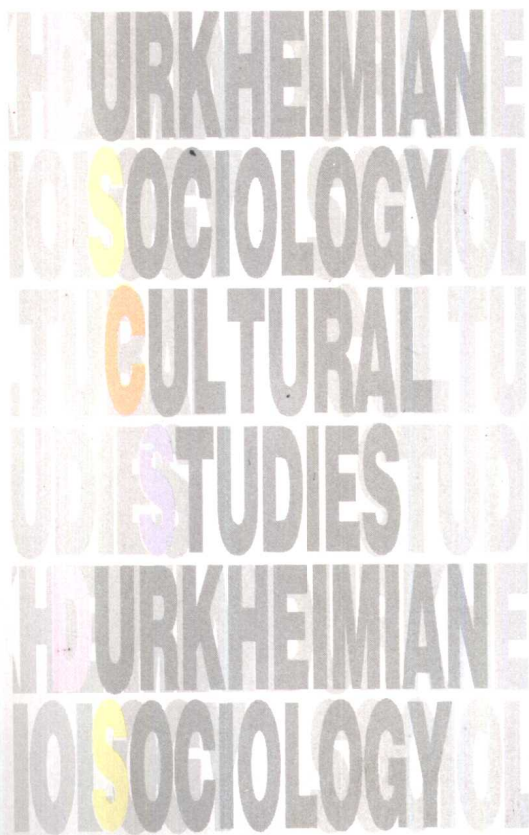


迪尔凯姆社会学

文化研究



杰弗里·亚历山大 编

戴聪腾 译

陈维振 审校

Cambridge Collection
剑桥集粹


迪尔凯姆社会学

文化研究

杰弗里·亚历山大 编

戴聪腾 译

陈维振 审校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沈阳

版权合同登记：图字06-2001-7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迪尔凯姆社会学 / (英) 亚历山大(Alexander, J. C.)编; 戴聪腾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9

(剑桥集粹)

书名原文: Durkheimian Sociology

ISBN 7-5382-6027-7

I. 迪… II. ①亚…②戴… III. 社会学-研究-文集 IV. 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34797号

Durkheimian Sociology

Copyrigh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2001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作者	杰弗里·亚历山大
发行	辽宁教育出版社	译者	戴聪腾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审校	陈维振
版次	2001年9月第1版	特约编辑	谢翰如
印次	2001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闵凯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1/32	责任校对	马慧
印张	10.875	封面设计	吴光前
字数	224千字	版式设计	赵怡轩
印数	1-3000册		
定价	22.00元		

译者致谢

本书在翻译出版过程中，承蒙菲律宾许自钦先生的支持帮助，特此致谢！

——译者

内容简介

埃米尔·迪尔凯姆（亦译“涂尔干”）的经典著作的特征是以结构方法来解释集体行为，现代社会科学界论及最多的正是其作品的这一特性。然而，这本书却摒弃了这种主要的结构研究方法，而利用了迪尔凯姆后期著作的观点。在迪尔凯姆的后期著作中，他转向对现代工业社会的象征理论研究。象征理论强调仪式的重要性，并把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张力放在社会的中心位置上。在这一过程中，撰稿者既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对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又对文化和社会的阐释提出了新的联系方法。

杰弗里·亚历山大在这本书的导言中详尽阐述了对迪尔凯姆的新阐释。这一新阐释贯穿在本书所有文章中。他的论点为后面栩栩如生和发人深思的各章提供了背景资料。这些文章从文化方面广泛地对民众动乱和社会运动这样的主题进行了阐释，所涉及的范围包括法国大革命和20世纪80年代波兰和尼加拉瓜的大动荡，政治危机，如水门事件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象征行为的创造性和偶然成分，其中包括亲密友谊的象征性及媒体活动的仪式和修辞等。

这些文章除了对迪尔凯姆的社会学重新进行探讨外，还推倒了这样的一个神话，即重视文化价值意味着守旧或无法对社会变迁进行分析并对规范理论与微观社会学之间的对立构成威胁。本书对迪尔凯姆的社会学与当代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和符号学的最重要发展之间的联系探究将使它在整个社会科学界中具有普遍的影响力。

撰稿者简介

杰弗里·C. 亚历山大是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研究生室主任兼教授，他的专著包括《社会学的理论逻辑》(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二十个演讲稿：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学理论》(Twenty Lectures: Sociological Theory since World War II)和《行为及其环境：新综合性理论》(Action and Its Environments: Toward a New Synthesis)。他曾经担任美国社会学协会理论部主任，他一直是古根海姆研究基金会的会员，而且最近又成为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社会科学的一个成员。

林恩·亨特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她是《新文化史》(1989)(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1989))和《性行为与国家》(Eroticism and the Body Politic) (1990)》的编者。

爱德华·A. 蒂赖亚基安是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兼国际研究院院长。曾发表各类有关社会学论题的作品，从迪尔凯姆和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到宗教社会学和现代性的比较问题。最近，他编辑了一卷《全球性危机》(The Global Crisis) (1984) 并与其他人一起编辑了《发达西方的新民族主义》(New Nationalisms of the Developed West) (1985)。他先后担任过美国宗教研究会会长(1981 - 1984)、美国社会学协会理论部主任(1974 - 1975, 1985 - 1986)，现任国际说法语的社会学家协会会长。

埃里克·W. 罗滕比勒现任艾奥瓦(衣阿华)大学传播学系的助理教授。他的兴趣在于定为公众象征活动实例的大众传播

过程。他的研究着重于作为社会团结节庆活动的媒体活动、商业性文化产业结构及其观众等。他目前正在继续撰写一系列文章，归纳各种社会体制中大众传播过程的功能。

露丝·A. 华莱士是华盛顿特区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她撰写了《当代社会学理论》(与阿利森·沃尔夫合著)、《美国的性别问题》(Gender in America) (与帕特里夏·伦格曼合作)并编辑了《女权主义与社会学理论》。她一直担任宗教社会学协会会长和美国社会学协会理论部的主任。

雪莉·F. 哈特利是海沃德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她已出版了三本专著并发表了许多文章，论题广泛，如非法性、人口、国际妇女地位、研究道德观、牧师妻子的多重作用、再生工程、最近的粮食与人口之间的竞争以及友谊等等。她担任《当代社会学》的副主编已3年。她也曾被选为美国人口协会理事并被聘请到卫生、教育和福利部(DHEW)国家保健研究所人口调查研究室供职。

兰德尔·柯林斯是加利福尼亚大学里弗赛德(Riverside)社会学教授。他撰写了一些专著和文章，其中包括《冲突社会学：解释性科学》(Conflict Sociology: Toward an Explanatory Science)、《文凭社会》(The Credential Society)、《三种社会学的传统》(Three Sociological Traditions)、《韦伯的社会学理论》(Weberian Sociological Theory)以及最近出版的《理论社会学》(Theoretical Sociology)。

汉斯-彼得·米勒是卡尔斯·海德堡大学的社会学助理教授。他的出版物包括《现代工业社会的政权与合法性》(Herrschaft und Legitimität in modernen Industriegesellschaften) (与曼弗雷德·科普合作)、《价值危机和社会改革：埃米尔·迪尔凯姆政论集》(Wertkrise und Gesellschaftsreform: Emile Kurkheims Schriften zur Politik)、《公道评判市场》(Gerechtigkeit, Kiskurs oder Markt?)和《合约

理论的新现象》(Die neuen Ansätze in der Vertragstheorie)(与卢西恩·克恩合编)。1986年到1987年他是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研究基金会的研究员。

丹尼尔·达扬是安妮伯格传播学学院的副教授兼南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影视学院的客座教授。他先后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特拉维夫大学、美国大学校际电影和文化研究中心(巴黎)、第二巴黎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教过电影电视学。除了他目前的电视学论著外,他的有关电影符号学的作品包括《经典影片的教学准则》("The tutor code of classical cinema")(收入B.尼科尔斯所编的《电影与方法》一书)和《西部片的粗糙雕刻画面:图像与观众的节目安排》(Western Graffiti: Jeux d'Image et Programmation du Spectateur)。

伊莱休·卡茨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社会学和传播学教授兼南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安妮伯格传播学学院的著名客座教授。他以前曾加盟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他的著作主要研究大众传媒的社会学方面,并且撰写了《个人的影响》(Personal Influence)(与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合作)、《休闲的世俗化》(The Secularization of Leisure)(与迈克尔·古罗维奇合作)、《第三世界的广播》(Broadcasting in the Third World)(与E.G.韦德尔合作)和《大众媒体与社会变迁》(Mass Media and Social Change)(与塔马斯·塞奇科合作)。他目前与丹尼尔·达扬一起从事有关“媒体活动”的研究,而且还与塔马尔·利布斯一起研究有关海外美国通俗文化的释译问题。

致 谢

本书是在一次有关“埃米尔·迪尔凯姆的宗教社会学”的小型而又热烈的讨论会上的那种生气勃勃的气氛之中构想出来的。那次讨论会是1983年6月由维尔纳-赖默斯基金会主办的。由于该基金会提供了一笔可观的资金，所以那次讨论会才可以在（德国）巴特洪堡举行。维尔纳·格普哈特友好地充当了那次会议的东道主，同时明确地围绕着“后期的迪尔凯姆主题”来组织那次讨论会。原来与会者中只有两个人——汉斯-彼得·穆勒和我本人——为这本书投稿，然而这并没有贬低那些早期讨论的价值。因此，我要向格普哈特和维尔纳-赖默斯基金会表示感谢。

我也要特别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休·艾伦-米尔斯，她提出了知识方面和组织方面的建议。她的不懈努力当然提高了这本书的质量。

虽然夏尔·勒梅特最初是这本书稿的局外评论者，但他却起着特殊的作用。他很快就以出版社评论家的姿态，亲自参与了对有关本书结构及其知识框架的决定。我尤其要感谢他对我约导言所作出的富有洞察力的极为有益的反馈。

埃米尔·迪尔凯姆去世已有70年了，但他的知识遗产——他晚年所留下的遗产——尚未得到充分的肯定，这正是撰写本书的基本前提之一。当然，在此期间，一些有名望的学者和理论家已经指明了方向。对我个人而言，罗伯特·贝拉是最为重

要的。贝拉是这位法国大师的一个敏悟的终身弟子，他把独特的、使迪尔凯姆有别于其他古典学者的象征符号的重点传播给他的学生们，这一重点也对当代社会学构成了如此重大的挑战。本书接受了这种挑战，即使它体现的只是沿着这个方向迈出的小小一步。

杰弗里·C. 亚历山大

目 录

撰稿者简介

致谢

导 言

迪尔凯姆的社会学与当今文化研究

杰弗里·C.亚历山大

1

第一部分 社会变革与神圣化

第一章 圣物与法国大革命

林恩·亨特

31

第二章 从迪尔凯姆到马那瓜：宗教复兴的革命

爱德华·A.蒂赖亚基安

59

第三章 阈限的斗争：作为仪式和阐释的大罢工

埃里克·W.罗滕比勒

90

第二部分 微观与宏观的象征关系

第四章 友谊的宗教因素：以经验为基础的迪尔

凯姆理论

露丝·A.华莱士和雪莉·F.哈特利

127

第五章 冲突社会学中的迪尔凯姆传统

兰德尔·柯林斯

148

第六章 社会结构与民间宗教：迪尔凯姆后期视

野中的合法化危机问题

汉斯-彼得·米勒

177

第三部分 仪式化与公众生活

第七章	明确表达的一致性：媒体活动的仪式和修辞	
	丹尼尔·达扬和伊莱休·卡茨	217
第八章	文化与政治危机：水门事件与迪尔凯姆的社会学	
	杰弗里·C.亚历山大	255
人名译名对照表		306
索引		323

导 言

迪尔凯姆的社会学与当今文化研究

杰弗里·C. 亚历山大

本书的目的在于把分析象征现象的方法更加直接地应用于社会学的论述。文化研究对人类研究的影响正处在一个爆炸期。在整个欧洲各种学科的各种各样的研究方向和美国的文学研究领域里，符号学、结构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后结构主义运动，从根本上影响了当今人们对社会经验及社会观念的理解。在美国社会学中，近20多年来出现了人类学里某种互补运动。这种象征人类学已经开始对相关学科，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的社会历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然而，在社会学里，特别是在但不仅仅是在披着美国外衣的社会学里，研究人员和理论家仍在进行最后的奋斗。在20世纪60年代里，人们进行一次总动员，反对与帕森斯相关的理想主义形式的结构-功能理论的霸权。虽然这次挑战取得了胜利，但取而代之的是同样片面的理论工作。目前支配本学科的微观和宏观主流不是反体系的，就是反文化的，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这种反文化的宏观方式强调的是冲突和社会结构，在早期反对功能主义的战斗中作出积极和富有新意的贡献。例如，它有助

于引起人们对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一致性观点作出反应。可是，这种 20 多年来一直被称之为新的社会历史学现在已经过时了，正在被一种具有明显的文化思潮的社会历史学所取代。同时，社会学仍然在前象征性思潮中陷入困境。宗教改革运动和文艺复兴好像就是在知识界的这个小小角落里被颠倒的。社会学家们仍然试图改革帕森斯教派。对社会学家来说，文化复兴是会到来的。迄今为止，在社会学里几乎没有人作过任何文化方面的分析。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次文化复兴的重要知识根源，实际上可以追溯到社会学本身的创始人之一迪尔凯姆身上。社会学家们主要是通过迪尔凯姆在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出版的著作《社会的劳动分工》、《社会学方法论》和《论自杀》来认识他的。正如柯林斯先生此后在本卷中所说的那样，社会学家正是以这些著作为基础来识别迪尔凯姆主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认为社会学就是这种迪尔凯姆主义，一方面他们强调外部的制约因素和“强制性的社会事实”，另一方面他们采用的是实证主义的经常是定量的方法。

然而，迪尔凯姆只是在完成这些著作之后他的独具特色的社会学文化纲领才出现。¹甚至在他早期的著作中，也毫无疑问地涉及到主观性和团结一致的问题，这当然确实如此。不过，只是在 19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进行的研究中，迪尔凯姆才牢牢掌握了象征变化过程的清晰原理。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对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迪尔凯姆（1960[1899]：351）*这样写道：“我们一旦看出许多问题与宗教社会学之间有联系，它们的面貌就会完全改变。”迪尔凯姆最终确实认为，非宗教社会变化过程

* 括号中第一个数字指章末所附《参考文献》中该作者该年出版的著作，第二个即方括号内的数字指该著作初版年份，第三个数字指该书中的页码。下同。——译者

的各种理论必须以宗教界的活动方式为模式。他强调说，这种宗教转向，不是因为他对教会的事物感兴趣，而是因为他想让文化的变化过程有更多的理论自主权。在宗教生活中，他发现了象征变化过程是如何按照自身的活动方式来起作用的这样一种模式。

迪尔凯姆在 19 世纪 90 年代后期的一些零散的文章里以及随后的直至他 1914 年去世为止的专论及讲稿中，发展了一种世俗社会的理论。这种理论强调的是：象征归类的独立因果关系的重要性，宗教与世俗之间象征性划分的主要作用，仪式行为的社会意义及象征的归类、仪式的变化过程和社会团结的形成之间密切的相互关系。迪尔凯姆在其中宣布并系统发展他称之为宗教社会学新理论的那些已出版的著作致力于研究古代宗教和当今人们将视为人类学的问题，这是不幸的事实，如果说它主要是出于偶然的话。迪尔凯姆只是在他未发表的讲稿里，才详尽阐述这种关于现代生活的世俗现象的新观点。

倘若迪尔凯姆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讲稿里的这种观点如今就会更加广泛地被世人所了解，因为他会毫无疑问地把它们编成学术著作正式出版，那么我们就有可供利用的对继续规定当代生活方式的“宗教”结构及过程进行系统探索的技巧。迪尔凯姆身后发表的讲稿（迪尔凯姆 1956, 1958a[1928], 1958b[1950], 1961[1925], 1977[1938]），肯定已把他在这方面的抱负和初步想法完全叙述清楚了。迪尔凯姆对教育、政治、职业组织、道德以及法律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性的深刻论述，并由此表明我们必须按照象征的归类方法来研究现代这些领域。这些领域的结构是由宗教和世俗之间的紧张状态决定的，它们的主要社会变化过程是仪式主义的，其最主要的构造动力与建立和破坏社会团结有关。这些讲稿说明了迪尔凯姆在他晚期的杰

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前几页中所告诫的真理。他在书中勾画了他的“宗教社会学”。迪尔凯姆声明，他“并不是仅仅为了讲述一种‘非常古老的宗教’的特点的乐趣”而投身于对它的研究。他争辩说（迪尔凯姆 1912: 1），如果他把土著宗教作为主题来研究的话，这只是“因为它似乎比任何其他东西更适合引导我们对人类的宗教性质的认识”，即它为我们指出了人类必不可少和永久性的一面。他坚持认为自己的观点是：不仅古代人类具有某种宗教性质，而且“现代人类”也是如此。

然而，问题不仅在于迪尔凯姆没能在他出版的著作里阐明这种非宗教社会的相当激进的新观点，而且还在于迪尔凯姆后期的这种观点最终根本没有被明确表达出来。在迪尔凯姆逝世后的几年里，他最亲近的学生和受过这些学生影响的人继续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有力地证明了他后期的文化研究途径所具有的影响力。阿尔布瓦克斯（如 1913, 1950）对工人阶级的消费和“群体记忆”的研究，西米安（1934）对货币的研究，莫斯（1967[1925]）对交换的研究以及布格勒（1908）对社会等级制度的研究，只不过是一些众所皆知的最能说明迪尔凯姆学派是如何把“后期的迪尔凯姆主义思想”付诸实践的例证。

可是，这些研究所开辟的前景从来就没有被广泛地开拓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迪尔凯姆学派的影响面缩小了。况且，那些试图继承迪尔凯姆学派的运动也歪曲了其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迪尔凯姆主义的有力推动下，开始出现了历史学的编年史学派。但是，这种学派所强调的“社会学”不久就偏向人口统计和社会政治结构并偏离了意识。另一方面，在莫斯的影响下，正统派的其他人也逐渐地转向人种史学（参阅沃各特 1976）的研究。由于这些方面和其他方面的发展，所以体现在迪尔凯姆后期纲领中的那些理论上的宏愿就逐渐消失了。到

了20世纪30年代,法国的知识界要么把迪尔凯姆主义视为不关心政治的、正在古体化的人种史学;要么把它视为科学社会学的决定论。由于这两方面的缘故,迪尔凯姆主义受到冷遇。

随着迪尔凯姆的思想观点超出了法国国界,这些观点被推向与迪尔凯姆后期著作的象征影响同样对立的位置。拉德克利夫-布朗以迪尔凯姆的名义创立了英国的社会人类学。但是,他的机械功能主义学说不如说是迪尔凯姆后期著作所批判的那种理论。20世纪30年代,当帕森斯创立社会学的功能主义学说时,他(帕森斯,1937)宣布迪尔凯姆为其创始人之一。可是,尽管帕森斯比大部分阐释者更多地看到迪尔凯姆文化的一面,他也明确地批评迪尔凯姆后期的那种以自主的象征变化过程为中心的说法。帕森斯坚持认为,社会学必须与社会价值及其制度化有关而不是与象征体系有关。况且,他把社会价值的重点(如:帕森斯,1967)与他寻求一致的社会秩序的基础联系在一起。²在后帕森斯时期,那些明显地继承了迪尔凯姆衣钵的社会学家(如布卢尔,1976,道格拉斯和怀尔达夫斯基,1982,特劳戈特,1985)趋于用一种甚至更加还原的方式使文化概念化。³

然而,虽然社会学还没有把迪尔凯姆的后期著作所提出的挑战继续下去,但在人类研究的其他学科里,学者们却积极地把这种挑战继续下去。这种关系往往是间接的,影响面不大。那些正在从事迪尔凯姆后期理论纲领研究的学者往往不知道有这样一种联系。况且,每当这种可能性被看出来时,它总是被否认。不过,我们可以有力地说明我前面提到的当代文化复兴是从迪尔凯姆而不是其他任何权威人士那里深受其益的。

例如:费迪南德·索绪尔的主导地位是大家所公认的,因为他首先想到了现代的结构语言学并使“符号学”概念化,使其成为符号的科学。尽管他从来没有直接引用过迪尔凯姆的东